

「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

• 于光遠

—

「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是我概括出來的一個名詞。「新民主主義論」這個名詞是大家很熟悉的，毛澤東那篇文章用的就是這個名詞。當然，「新民主主義論」與《新民主主義論》兩者不是同一個概念，前者是一種觀點、一種學說、一種理論，後者是一本書的名稱。我以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有兩個組成部分，一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論」，還有一個是「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新民主主義革命論」說的是關於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個理論與列寧關於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一脈相承；而「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則是關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有可能建立起來的新社會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兩者當然是密不可分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產兒，講新民主主義革命就要講革命的目標——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講新民主主義社會就要講它的來源——新民主主義革命，因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母親。因此，它們是統一的新民主主義論的兩個組成部分。

但是，長期以來，人們沒有注意甚至沒有區分這個理論有這樣兩個組成部分，而把它們混為一談。而且，人們更多注意的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關於革命的論述，卻忽略了其中關於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論述。忽略的原因，我以為首先在於毛澤東本人。儘管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是他提出並且加以闡述的理論，但是他沒有提出「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他在革命完結之後不久就拋棄了這個理論，並且指責和批判其他堅持這個理論的中共領導人（如劉少奇、周恩來），使得這個理論不僅沒有能夠一以貫之地付諸實施，甚至提及「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都成為一種罪名。拋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結果，導致了中國社會二十餘年動盪不已，停滯不前。因此，追溯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從提出到被拋棄的命運，對於反思當代中國的歷史是很有必要的。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論」和「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兩個部分組成。前者說的是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列寧關於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一脈相承；後者則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有可能建立起來的新社會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是長期以來，人們把它們混為一談。

二

《新民主主義論》原是1940年1月毛澤東在延安舉行的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發表的講演稿^①，後來經過整理，全文發表在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創刊號上，不久出了單行本。

《新民主主義論》明確指出革命勝利後的社會是「新民主主義社會」。毛澤東說：「這個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其社會性質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②，這個革命「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③。「新民主主義社會」這個概念，使《新民主主義論》不僅包括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內容，而且包括關於革命勝利後建立起來的新社會的內容，因而使「新民主主義論」成為一個既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論」又包括「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完整理論。應該指出，在這裏概括出來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這個概念應該包括這樣一層意思：那就是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因為一個社會形態決不會是很短時間的。換句話說，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那種「一方面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又一方面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的局面，將是一個相當長歷史時期的現象。

《新民主主義論》不僅使用了「新民主主義社會」這樣一個概念，還較為具體地指出了這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毛澤東特別重視這個社會的政治方面，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把「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放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之前去講。毛澤東把這個社會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或「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即用「民主」這樣一個政治範疇來做一個社會形態的名稱，也充分說明他特別重視這個社會的政治方面^④。這部著作講了新民主主義政治的特徵——既不是資產階級專政，也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上面說的「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⑤。對「新民主主義經濟」，他指出的是^⑥：

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

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文化」下的定義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⑦，也就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講的許多話，是馬克思主義文獻中已經講過的。比如，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中的革命屬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性質；關於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沒有完成的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必須把民主主義革命作為自己推進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步；關於革命不應該停頓，在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後，必須繼續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而奮鬥；關於無產階級要爭取堅持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權，等等，馬克思、恩格斯就講了不少，列寧則講得更多、更具體。在這裏我不想大量引證，以免過多地佔用讀者的時間。

1940年1月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明確指出革命勝利後的社會是「新民主主義社會」。毛澤東用「民主」這樣一個政治範疇來做一個社會形態的名稱，說明他當時特別重視這個社會的政治方面，指出它既不是資產階級專政，也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

到1945年黨的七大，毛澤東把「新民主主義論」寫進大會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之中，正式成為了黨的綱領。它在內容上比《新民主主義論》更進一步，比如：明確地表示完全同意孫中山在工商業問題上的主張；強調在「新民主主義制度的任務」中應該包括「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和有益於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

但是，毛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在他以前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沒有講過的重要觀點，可以說是他的獨創。馬克思主義者根據生產方式的演變，把人類社會以往發展的歷史概括為這樣一個基本的序列，那就是：原始公社的——奴隸佔有制度的——封建制度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⑧。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還根據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研究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後還有一個新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這裏講的五種社會經濟形態，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中的基本社會經濟形態。在每種社會經濟形態之中還有比較小的發展階段。比如在資本主義這種社會經濟形態中，就劃出了壟斷前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這樣的階段。此外，在前後兩種基本的社會經濟形態之間，還可以有「過渡性質」的社會經濟形態。這樣兩類社會經濟形態（即比較小的社會發展階段和過渡性的社會發展階段）都是非基本的社會經濟形態。我們還看到，還存在因為具體的歷史條件，在某個地區、某個民族聚居地形成的某幾種基本社會形態的結合物，我們也應該把它們看作非基本的社會經濟形態。中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就屬於這一類非基本的社會經濟形態。總之，關於人類社會經濟形態本身就具有許多複雜的情況。當然，五種基本的社會經濟形態的說法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可以為分析判斷事實上存在着的、或者將要存在的許許多多社會經濟形態，提供一個理論框架。但是我們決不能把對社會經濟形態的看法簡單化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中出現的社會經濟形態總是具體的，對它須要作具體的研究。毛澤東大膽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就是人類歷史上有可能出現的一種具體的社會經濟形態。應該承認，這樣一種見解是卓越的。

三

《新民主主義論》雖然就其內容來說屬於綱領性質，而且發表之後其中的論述為黨所接受，但它在1940年發表時還是以毛澤東的演講、著作的形式出現的。到了1945年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把它寫進自己代表中央委員會向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即《論聯合政府》）之中，作為黨的一般綱領中的最低綱領提出的時候，它就正式成為了黨的綱領。在這個政治報告中，對於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綱領有很長的一段文字。它寫得很明確，而且在內容上比《新民主主義論》更進一步。比如：

(1) 明確地表示完全同意孫中山在工商業問題上的主張。孫中山的主張是：凡是「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用這樣的辦法來「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⑨。

(2) 強調在「新民主主義制度的任務」中應該包括「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能夠自由發展那些不是『操縱國民生計』而是有益於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⑩。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還沒有使用「自由發展」的字樣。

(3) 講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中包括的三個組成部分，排列的次序是：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對國家經營講了一個條件是：「這個國家經營

的所謂國家，一定要不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一定要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①（1953年出版《毛澤東選集》時，這一句改為：這個國家「一定要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姑勿論這樣的修改是否比原來的內容更正確，《論聯合政府》是黨代表大會討論通過的黨的重要文獻，未經黨代表大會便做修改是完全不應該的。《毛澤東選集》編輯出版時這樣做，使得人們根據它來研究歷史時必須去作考證，而這種考證又不是很容易做的。除了這一處修改外，還有其他重要的修改。下面筆者還將隨時指出）。

（4）明確地指出^②：

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而在中國，為民主主義奮鬥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毛澤東選集》出版時，在「新式」兩字前加上「由共產黨領導的」七個字——引者註），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這裏強調了為民主主義奮鬥的長期性，強調了不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

（5）強調共產黨人「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提倡它的發展（《毛澤東選集》出版時，在「反而」兩字後加上「在一定的條件下」七個字——引者註）」，因為「拿發展資本主義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毛澤東選集》出版時，把「發展資本主義」改為「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引者註）。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毛澤東選集》出版時，在「有利於無產階級」後加上「或者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十一個字——引者註）。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說也奇怪，有些中國資產階級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而要轉彎抹角地來說這個問題。另外有些人，則甚至一口否認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廣大的發展（《毛澤東選集》出版時，把「廣大」兩字改為「必要」——引者註），而說甚麼一下就可以到達社會主義社會，甚麼要將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畢其功於一役」。很明顯地，這類現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有些則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於民眾的欺騙手段。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獲得廣大發展的便利（《毛澤東選集》出版時，把「獲得廣大發展」改為「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範圍內獲得發展」——引者註），才能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③

1953年出版《毛澤東選集》時，對《論聯合政府》作了多處重要修改。如把「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這一句改為：這個國家「一定要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又如強調共產黨人「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提倡它的發展」，《毛澤東選集》出版時，在「反而」兩字後加上「在一定的條件下」。

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社會論之後，中共其他領導人也在對未來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加以闡釋。就我手邊的材料來看，劉少奇在1948年9月寫的〈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與合作社〉，就是一篇重要的相關文章。在文章中，劉少奇一方面肯定了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一方面又具體地講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之間的競爭（他用的是「競爭」這個字眼），要求我們有清醒的頭腦，要求制服投機商業，要求社會主義者善於經營管理經濟，善於同資本主義經濟進行和平競爭，並且指出，否則「我們就會要失敗，無產階級對於國家的領導權就要被推翻」^⑭，而如果善於做那樣的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就能一直發展下去」^⑮。

張聞天也在1948年9月為中共中央東北局寫了一個報告交到黨中央。這個報告提出了新社會經濟構成的五種成分，即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其中有一種經濟成分是劉少奇文章中沒有提到的，那就是「國家資本主義」。張聞天在報告中說：「這種經濟形式，在東北已經開始出現，而且以後還會發展。」^⑯他認為：「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它（指國家資本主義——引者註）應該成為私人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有利的方向」^⑰。有研究者說這個提綱受到黨中央領導層的高度重視，毛澤東、周恩來都對它作了肯定的批示。劉少奇給有關同志的信和11月6日中共中央給東北局的電報，還提出準備將此件所提出的主張作為全國解放區經濟建設的方針。對新社會經濟結構作這樣的分析，到那時為止，只有張聞天寫的這個報告和上述劉少奇那篇文章是最完全、最詳細和準確的。

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社會論之後，劉少奇、張聞天也在1948年9月分別撰文闡釋新民主主義經濟形式。毛澤東在1949年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提到：「中國還存在着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這是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向列寧在俄國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論」靠攏的苗頭。

四

1949年3月舉行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作了著名的報告。總的說毛澤東的報告與《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是一致的，而且寫得更具體和給人以很快可以實行的感覺，因為它是以一個即將執政者的姿態說的話。但是我又感到七屆二中全會出現了一個離開新民主主義社會論，而向列寧在俄國提出的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理論靠攏的苗頭。毛的報告中講了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沒有講過的觀點，寫進了關於基本矛盾的一段話^⑱：

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並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後，中國還存在着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

當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矛盾在我國上升為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時，黨在《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中規定的政策路線就會改變。因此，我認為這個報告有這樣一種兩重性：一方面貫徹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觀點，並且使它更加具體化了；另一方面又有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苗頭，或開始做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準備。

七屆二中全會是一個可以這樣執行也可以那樣執行的會議。這一點當時人們看不清楚，可是後來就明白了。當時像我這樣比較重視理論而且在中央機關

工作的人，也十分明白這句話的重要。但是當時我並沒有深思這句話與新民主主義論之間的矛盾。而且我以為，即便是毛澤東和劉少奇本人，也未必理解這是一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向列寧在俄國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論」靠攏的苗頭。從劉少奇在會上發表的言論來看，他是二中全會上的主要人物之一。劉少奇也講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個基本矛盾，而且講得不少，但他設想的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的時間比較長遠，認為這個轉變是逐漸實現的。劉少奇的這種想法既可從1948年9月到1949年3月二中全會這段時間內他所寫所講的那些話中看出，也可以從1949年4月到5月這段時間內，他去天津考察和指導的一系列講話中看得很清楚。

當時天津是中國第二大工商業城市。1949年4月間劉少奇去天津時，這個城市解放近三個月了。資本家中普遍出現了一種觀望情緒，延遲開工復業。結果是工業資本萎縮，大量游資轉入投機商業。一些幹部群眾則以為解放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問題都能一下子得到解決；有些工廠工人甚至要求平分工廠財產。這使天津的經濟遇到了很大困難。天津黨委對具體執行有關私人資本的政策也缺少辦法。經過調查後，劉少奇把所遇到的問題歸納為資本主義工業與原料供應者（主要是農民）之間、資本主義商業與消費者之間、工業投資與商業投資之間這樣幾對矛盾，注意到了資本家的顧慮和幹部職工中的「左」傾情緒。他作了多次講話，中心精神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講公私、勞資、城鄉、內外這「四面八方」，也就是宣傳「新民主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思想。他多次說明黨允許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劉少奇不迴避講「剝削」這兩個字，講了資本主義的工商業當然存在剝削勞動者的事實，講了資本主義制度、剝削制度今天還不能廢除；在中國目前的條件下，私人資本主義的若干發展是進步的，對於國民經濟是有利的，對中國是有利的，對工人也是有利的；劉說：「資本家是剝削工人的，但是他的剝削方式是資本主義的不是封建主義的，今天我們不反對，而且要發展。」他對工商界人士還講「現在私人資本是有積極作用的，必須充分發揮」，說「今天中國的資本主義是在青年時代，正是發揮它的歷史作用，積極作用和建立功勞的時候，（工商界）應趕緊努力，不要錯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一個《決議要點》，提出了「三年準備，十年建設」的方針。隨後劉少奇在好幾個場合講何時採取社會主義步驟的問題，指出這至少是十年二十年後才能提出的問題，要防止「左」傾冒險主義。他把以上的這個建設階段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建設階段」。3月份，他在黨的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提出，中國共產黨「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鬥爭，在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鬥爭，最後要為實現共產主義制度而鬥爭」^⑩。7月5日劉少奇還在中南海春藕齋向馬列學院的學員作了名為「中國共產黨今後的歷史任務」的報告。他說，中國有五種經濟成分，這「五種社會經濟成分及其相互關係，在建設過程中將要逐步地引起變化。五種經濟都會有發展，也要使它們都有發展，它們的基本關係不會有大的變化」^⑪。還說：「上述情形是整個新民主主義階段中的情形。這段時間，估計至少十年，多則十五年，二十年。」^⑫這裏講的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是從三年準備之後的1952年算起，也就是1962年、1967年、1972年。從這個報告，

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三年準備，十年建設」的方針。7月5日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今後的歷史任務」的報告中說：「整個新民主主義階段中的情形。這段時間，估計至少十年，多則十五年，二十年。」但劉的這個思想沒有得到毛澤東支持，中國以後走的是另外一條路。

我們不僅可以看出劉少奇對新民主主義這個發展階段需要有多長時間的估計和設想，也可以看出他估量這個時間的依據。〈中國共產黨今後的歷史任務〉可以視作劉少奇提出關於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的一個完整綱領。但是它並沒有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而只是他寫的一篇文章，而且可以說這是他關於「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寫的最後一篇文章。劉少奇的這個思想沒有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中國以後走的是另外一條路。

五

1951年4月，山西省委寫了題為《把老區的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給中共中央華北局和中共中央。報告認為，應當逐步地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而劉少奇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見，並說應批評山西省委的報告。但是毛澤東明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並與劉少奇談話。這次談話後，可以說就開始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社會論」。

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歷史命運的角度來說，1951年7月或8月發生了一件大事。這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寫了一個題為《把老區的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給中共中央華北局和中共中央。報告認為，隨着農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農民自發力量是發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們所要求的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而是向着富農的方向發展。這就是互助組發生渙散現象的最根本的原因。省委主張，「對於私有基礎，不應該是鞏固的方針，而應當是逐步地動搖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②。據當時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回憶，在這之前，華北局對省委的這些觀點已有所了解，華北局的同志和山西省委和長治地委的同志早就各自表示不同的看法，並把這種不同意見向劉少奇彙報過。劉少奇也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見，並說在收到山西省委的報告後應予以批評^③。

7月3日，劉少奇對山西省委的報告作了批示^④：

在土地改革以後的農村中，在經濟發展中，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已開始表現出來了。黨內已經有一些同志對這種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表示害怕，並且企圖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們幻想用勞動互助組和供銷合作社的辦法去達到阻止或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該逐步地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他還說：「山西省委的這個文件，就是表現這種思想的一個例子。」

但是，毛澤東卻明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他在同劉少奇的談話中，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生長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觀點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他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採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不論毛澤東所持的理由和提出的主張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是否站得住腳，這次談話後，「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可以說就開始被放棄了。

在這之後毛澤東着手推進農業互助合作的事情，命陳伯達起草《中共中央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決議》。到這年10月，這個決議(草案)的起草已經初步完成。

這時中共中央東北局向中央送交了一個關於東北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的報告。東北局第一書記高崗主張根據群眾的自願和需要，對生產互助合作加以積極扶助與發展，並提出要逐步把農業互助合作由低級引向較為高級的形式。這正是毛要陳伯達起草的那個決議(草案)所主張的。毛認為東北局所提出的方針正確，決定把東北局的這份報告印成小冊子發往各中央局、分局和各省市委和中央黨政各部門，還把中央已經起草有關決議(草案)且不久可以發出的信息告訴了東北局。這個文件在1951年12月15日正式印發，毛澤東要求「一切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區都要解釋和實行」，並且「當作一件大事去做」^⑤。

毛澤東批評劉少奇並且自己來做這件事，當然會有這樣的一個目的，即要通過實踐證明他主張的辦法是正確的，而劉少奇曾經發表過的言論是錯誤的，因此他是很認真也很慎重地進行這個工作的。

六

1952年1月開始反對資本家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經濟情報的運動。「五反」運動是建國後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間的一次較量，它給了資本主義沉重的打擊，實際上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的一個有力的社會主義步驟。雖然黨聲明對資本主義經濟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沒有任何變化，但資本家卻別有一番感受。

從政策上講，「五反」運動同「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沒有關係。在任何社會制度下，都有合法不合法的問題。但是當時國家法律不健全，「五反」運動採取了階級鬥爭性質的政治運動方式進行。就實際影響來說，它就同「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發生關係了。「五反」不僅是一場經濟鬥爭，本質上更是運用黨和群眾的政治力量對資產階級進行的旨在殺資產階級的威風，大大削弱資本主義的地位，大大樹立社會主義國家對資本主義經濟實行管理的權威的政治鬥爭。運動的作法很像打仗，毛澤東是這場戰爭的總指揮，坐鎮北京，掌握敵情，下達指標，計算戰果，讓整個資產階級和與資本家有關係的黨員和社會人士膽戰心驚。表面上看沒有改變黨的政策，實質上已經不再堅持允許資本主義有一定程度發展的新民主主義政策。運動的進程基本上如毛澤東預計的那樣，由於打得狠，資產階級驚恐不安，不少工廠商店停工、停業、半停業，國營企業也受到衝擊，一些經濟部門幾乎停頓，基建項目紛紛下馬，許多地區生產下降，市場萎縮，稅收減少。

趁着「五反」運動高潮的勢頭，毛澤東提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1952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不是十年以後才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形成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完整表述。9月公布的國慶四周年口號中宣布了這條總路線。12月底，中共中央又批發了中央宣傳部擬定的《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這個提綱詳細闡述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在審定和修改這份文件時，毛寫了如下一段話^⑥：

1952年的「五反」運動表面上與「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沒有關係。但就實際影響來說，「五反」本質上更是運用黨和群眾的政治力量進行的旨在殺資產階級威風，樹立社會主義國家對資本主義經濟實行管理的權威的政治鬥爭；已經不再堅持允許資本主義有一定程度發展的新民主主義政策了。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我是這個提綱的起草人之一。據我所知，這個提綱的第一部分是屬於理論性的部分，毛對這一部分修改也較多。從此，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就正式提上日程，並且逐步加快了步伐。

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過程中，發生了一件大事，這就是1955年下半年批判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1955年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提出計劃：到1956年秋收前，農業合作社從經過整頓保留的六十五萬個，發展到一百萬個。毛澤東視察南方後回京，認為一百萬個少了一些，主張增加到一百三十萬個。鄧子恢不贊成修改計劃，認為合作社不宜發展過快，要求不能過急。毛澤東認為鄧子恢和農村工作部的思想右了，對農村合作化不積極。7月31日中共中央召集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毛澤東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長篇報告，嚴厲批評鄧子恢，指責鄧是「小腳女人」。我在中央宣傳部聽了詳細傳達，也「學習」了這個報告，留下的印象很深，特別是報告中開頭所講的印象更深^②：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

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

1955年10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召開，全會的第一個議程就是討論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決議。為這個全會做準備，除了起草決議草案外，毛澤東還着手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用報紙上有關合作化的報導說話，並且親自寫了兩篇序言和104篇按語，以此說服那些不接受他的想法的人。他說^②：

在我們黨內，對於這個總路線的提法和時間的規定，從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實際上是不同意見的。這種不同意見，在目前，主要地表現在關於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

從1953年到1956年，用三年多一點時間，採取若干步驟，中國就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1955年3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講話，明確地說^②：

中央委員會根據列寧關於過渡時期的學說，總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經驗，在我國國民經濟恢復階段將要結束的時候，即1952年，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1952年，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要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1955年，毛澤東嚴厲批評要求合作社不能發展過急的鄧子恢。從1953年到1956年，用三年多一點時間，中國就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毛在中國實行消滅資本主義，推進社會主義，可以說，毛澤東徹底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社會論」。

因此在1952年到1956年過渡時期總任務完成後這一段，中國共產黨的實踐所依據的不再是「新民主主義社會論」，而是在「列寧關於過渡時期的學說」基礎上的毛澤東的過渡時期的思想。毛在中國實行消滅資本主義，推進社會主義，展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基本矛盾，連語言大都也是用列寧的；同時毛又有自己的一套，因此他能做到列寧提出、然而在俄國不能做到的那個地步。到了這個時候，可以說，毛澤東徹底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社會論」，而中國的「過渡時期」也已經接近尾聲。

七

1956年，中國宣布進入了社會主義。這是建國以後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一系列社會主義改造的結果。在1956年，中國是一個單一所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這種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不適合中國社會生產力狀況，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不能起到很好的促進作用。這樣的社會主義未必比發達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先進。

1956年的中國社會是怎樣的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呢？生產力水平這麼低，生產水平也並不真正先進，只好把它看作母腹中未發育成熟、先天不足的社會主義「早產兒」。早產兒如果得到精心護理，也有可能成長為健康的兒童。可是對它的護理又極為不當。那些年，給這個「早產兒」吃了一服又一服「虎狼藥」。1957年開展反右派鬥爭，不是去建設，而是提出要進行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1958年搞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完全不顧主客觀力量，不顧社會發展的規律，使中國人民遭受極大損失。1959年廬山會議，發動批判彭德懷和「反右傾」的鬥爭。隨後又是大規模的所謂農村和城市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最後終於發動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如果說從1957年反右派鬥爭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前的二十年時間內的社會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話，那就是一個經濟停滯、政治動盪、文化落後、人民窮困的「社會主義社會」。我把這個階段稱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起始階段。這是一個具有非常特殊規定性的階段。把這個階段僅僅說成是社會主義的「早產兒」已經不夠了。「早產兒」只能說明它出世前的情況，不能說明它「成長」的情況。在那二十年中，它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的「畸形兒」，而且是十分孱弱、面臨夭折的「畸形兒」。至於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早就沒有人再提到它了。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中國歷史的深刻轉折，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期。這樣一個轉折，引起人們重新思考中國所處社會階段的問題。1979年，蘇紹智、馮蘭瑞兩位理論工作者從理論上提出問題，認為當前中國社會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沒有達到馬克思在《歌達綱領批判》中稱之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稱之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水平。有人指責蘇、馮否認中國是社會主義社會，從政治上施加壓力。1980年至1981年，起草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時，我站在了蘇、馮兩位學者方面，同主持決議起草工作的胡喬木爭論，堅持要把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判斷寫進

如果說從1957年反右派鬥爭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前的二十年中國還是社會主義的話，那就是一個經濟停滯、政治動盪、文化落後、人民窮困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個階段是社會主義的「畸形兒」，而且是十分孱弱、面臨夭折的「畸形兒」。至於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早就沒有人再提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中國歷史的深刻轉折，中國進入一個新時期。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報告說到：「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在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物質文明還不發達。」這樣寫，還是由於我的提議並得到胡耀邦同意的結果。十三大後，人們才又想起「新民主主義社會論」來。其實，不論「新民主主義社會論」還是「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今天都已經離開我們很遠很遠了。但是歷史的教訓是一定要記取的。

決議，反對在決議裏寫進批判他們提出階段問題的語言。不過，我認為說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比說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更好。我主張，中央應該肯定中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定要承認討論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的重要意義。經過尖銳的爭論，才在決議中寫到：「儘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但是毫無疑問，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任何否認這個基本事實的觀點都是錯誤的。」這才算是中共中央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現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但我不滿意這個結果，因為這裏的「儘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一句話，是作為批判「任何否認」中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的觀點的陪襯物寫进去的。而把從1957年到1978年那個經濟停滯、政治動盪、文化落後、人民窮困的社會稱做「社會主義社會」，對我來說是很勉強的講法。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報告，在論述「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個問題時說到：「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在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物質文明還不發達。」這樣寫，還是由於我的提議並得到胡耀邦同意的結果。當然，那一次沒有發生任何爭論。1986年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進一步指出：

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不但必須實行按勞分配，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和競爭，而且在相當長歷史時期內，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標下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這樣才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判斷，作為指導解決實際問題的理論觀點。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報告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立論，第一次闡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指出正確認識這一點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系統形成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建設與改革的基本綱領。

十三大後，人們才又想起「新民主主義社會論」來。其實，不論「新民主主義社會論」還是「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今天都已經離開我們很遠很遠了。但是歷史的教訓是一定要記取的。

註釋

① 這個講演原題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發表於1940年2月15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雜誌創刊號。同年2月20日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再次刊登此文，並改為現題。這個演講雖然是在文化界作的，文章也是在文化刊物上發表的，但實際上它已經大大超出了文化的範圍，而被賦予了豐富的政治內容。

②③④⑤⑥⑦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671；672；672；678；698。

④ 有些研究者對毛澤東使用「新民主主義社會」這個名稱有意見，認為一個社會不能用政治範疇來命名。這個說法當然是有道理的。但是這個名稱是毛澤東當時使用

的。當時沒有展開過使用這個名稱是否妥當的討論。現在已經用了多年了，我認為沒有必要更改。

⑧ 在這裏我採用了斯大林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這部著作中的說法。以前有一個說法，把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這五個基本階段說成是「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這個說法沒有斯大林的說法準確，因為原始社會是一個沒有財產、沒有財產觀念的社會，說「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不妥。馬克思也沒有這麼說過。「奴隸社會」也不如「奴隸佔有制度社會」準確，至於資本主義社會之後的那個社會，也有人說是共產主義社會。如果要把資本主義社會後的社會稱做共產主義社會也可以，但應該準確地稱之為「社會共產主義社會」。

⑨⑩⑪⑫⑬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載《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057；1058；1058；1060；1060-61。

⑭⑮ 劉少奇：〈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與合作社〉，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社總社合編：《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頁7；7。

⑯⑰ 《張聞天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406；407。

⑱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433。

⑲ 劉少奇：〈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載《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62。

⑳㉑ 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今後的歷史任務〉，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368-69；370。

㉒ 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區的互助組織提高一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頁354。

㉓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185-87。

㉔ 劉少奇：〈劉少奇對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區的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批語〉，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頁350。

㉕ 毛澤東：〈中央關於印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決議草案的通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頁578。

㉖ 毛澤東：〈對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的批語和修改〉，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頁405。

㉗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168。

㉘ 毛澤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218。

㉙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138。

于光遠 1915年生；1936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1949年後，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處副處長、科學處處長，中共中央科學小組成員、國家科委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于光遠先生也是國內外的著名學者，在經濟學、哲學、社會學、教育學、政治學等諸多領域，著述等身。近十多年來，他撰寫了不少有關中共黨史、當代中國歷史和歷史人物的研究和回憶性著作，主要有：《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等等。